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九十周年纪念

啓功題簽



中華書局
90
周年紀念



1912~2002



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

啓功題簽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 /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ISBN 7-101-03398-9

I. 中… II. 中… III. 中华书局 - 纪念文集 IV. G23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3715 号

责任编辑: 樊玉兰

装帧设计: 牛茜茜

平面制作: 刘 丽 许丽娟

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北京胶印二厂印刷

开本: 230mm × 297mm 1/16 印张: 13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80.00 元

ISBN 7-101-03398-9/k.1466

我们曾经有过辉煌
我们正在努力创造辉煌
我们坚信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做好古籍整理工作，
继承民族文化遗產。

陳雲
一九六九年



整理古籍為社會主義建設
服務

陳雲
一九六九年



整理古籍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陳 雲

做好古籍整理工作，繼承民族文化遺產。

——陳 雲





199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中华书局展台



中華文化繁
輝燦爛
聚纂
傳世
先賢
從人

祝中華書局

八十五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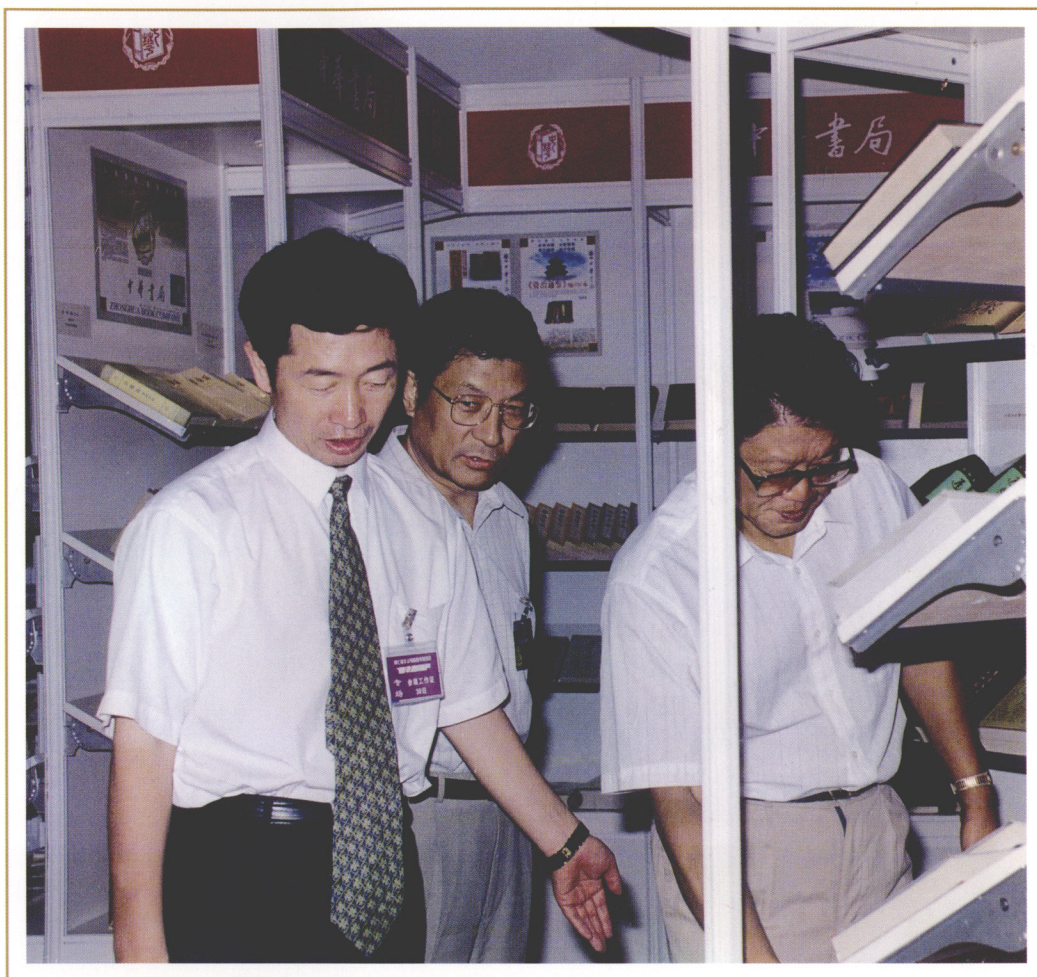
李鐵映

一九九九年

一月

中华文化灿烂辉煌，聚纂传世光照后人

——李铁映



199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视察中华书局展台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邹家华视察中华书局展台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视察中华书局展台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视察中华书局展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贺 词

值此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之际，谨致以诚挚的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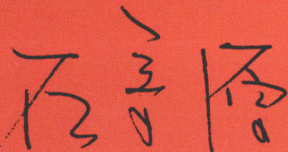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出版机构之一。九十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近两万种各种类型的图书，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为我国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辛亥风云巨变之际，中华书局成立于上海。为适应新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华书局编制、出版了新式中华国文教科书，并很快成为旧中国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企业。同时，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大型辞书工具书和影印古籍，如《中华大字典》、《辞海》、《饮冰室合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

建国初，随着祖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华书局迅速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潮之中。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总部从上海迁至北京。1958年成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全体员工认真落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坚守出版专业分工，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为职志，出版了一大批高品质的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图书，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组织全国上百位专家学者，历经20年，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此外，中华书局还先后出版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词》、《资治通鉴》、《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永乐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等优秀图书和《中国历史小丛书》、《诗词格律》等普及读物，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华书局进行了几轮深化改革，实施以建立现代出版运营制度为主，以调整图书结构，构建营销网络为两翼的“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以积极的姿态、创新的面貌在新时代中不断前进。

值此中华书局九十华诞之际，衷心祝愿中华书局在新千年里，发扬优良传统，为祖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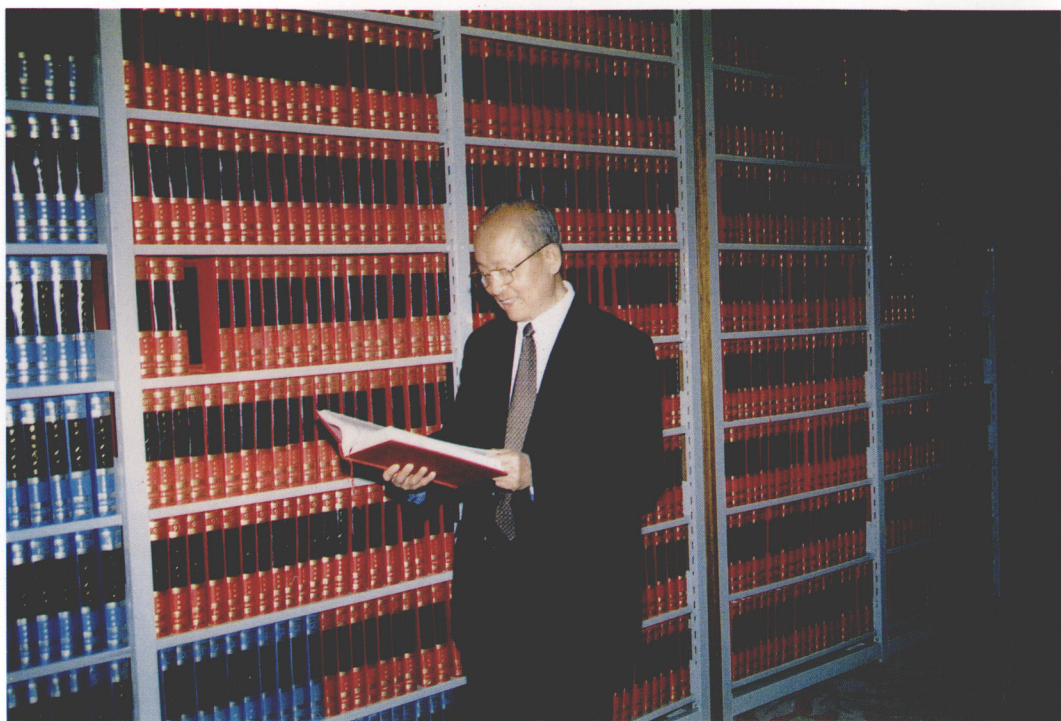


2002年4月16日



石言悟

中华书局在1949年以前实际上就是一个出版集团，拉动很快，两三年之内，就做大、做强了。这些都值得总结、借鉴。你们要从现在起，好好总结中华书局的精神。90周年局庆时提出课题，经过10年的思考，到100周年局庆时，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规范的提法。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抓住新式教材的编写机会，在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中不断壮大发展，应该叫作创业精神、开拓精神，或者创新精神。现在你们由7个出书板块向12个板块进军，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也是一种开拓精神。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中华书局的特色。希望你们实事求是地把中华书局的精神总结出来，到100周年局庆时成熟，用它去激励大家。



亲木文

中华书局九十华诞，这不仅是书局同仁的喜事，也是出版界值得纪念和庆贺的一件盛事。

中华书局作为我国成立最早的近现代出版社之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书局成立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在古籍整理出版与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深堪嘉许。

在新世纪之初，祝愿中华书局与时俱进，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做得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帮助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学习历史与研究历史，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吸取经验教训和精神养料，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张先

中华书局作为我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出版机构之一，九十年来，为我国的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海内外享有盛誉。1958年成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后，中华书局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为己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理古籍和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成绩卓著，蜚声学林。

值此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祝愿中华书局发扬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为我国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杨紫云

中华书局屹立在中华大地，海内外知名，就是因为有其优良传统。中华书局的传统，就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整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一点是中华书局的根本。保持传统，才能保持特色，保持特色才有生命力。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并不冲突，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它传承的历史。中华书局整理和出版中国古籍，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所以，要纪念中华书局90年，总结这90年的经验，关键的一点是“保持优良传统，坚持推陈出新”。

序

这是一篇久久不能下笔的序言，原因是我一直徘徊在是从叙述陆费逵先生创建中华书局的历史写起，还是从九十年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写起。终于，“叙述”服从了“说明”。

九十年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在九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中华书局先后有着两个传统。

一个传统，是从1912年到1949年间形成的。这时的中华书局是个大型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的出版企业，总局设在上海，海内外共设50余处分局，分销处1000余家。职工人数已难查考，一说“全局员工至少当在6000人以上”，又有一说“仅上海、香港两地印刷厂职工就达3000人之多”。同时，中华书局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尤其是彩印业务号称远东第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华书局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如成立之初，股本仅为2.5万元，可1913年就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设9处分局；1914年又增加到27处；1916年又发展到40处。仅用四年的时间，分局就遍布国内并向海外发展，其规模扩大之快，资产扩张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为什么仅在四年时间，中华书局就能形成一个遍布全国并跨海外的大型出版集团？这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深思。书局从1912年到1949年，究竟出版了多少种图书，现已难以统计。有的说“出版新旧书籍两万

余种”，有的说近九千种。图书品种覆盖百科，无所不包，读者对象从儿童到老叟无所不及。1949年前出版的重要图书有：《中华大字典》、《康熙字典》、《辞海》等辞书；《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古籍图书；卢梭《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翻译图书；还有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康有为《大同书》，等许多国内学者及政界要人的著作等等。如无宏篇巨制，难以一一缕述。当时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我国两大出版企业，既相互友好，又相互竞争，难分伯仲，至今人们还不时地说到一些往日两家互争高下、暗决雌雄的趣事。

另一个传统，是1949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形成的。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将中华书局作为办事机构，并确定中华书局为国家专门出版古籍的出版社。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出版了大量的古籍整理图书，如“二十四史”、《清史稿》、《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甲骨文合集》、《中华大藏经》、《新编诸子集成》等。另外，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如《管锥编》、《汉语音韵学》、《问学集》、《殷周金文集成》、《汉语现象论丛》、《太平天国史》、《体用论》、《新唯识论》等。在整理出版古籍方面，“二十四史”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根据书局的档案记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标点出版“前四

史”，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同志商量，扩大到点校全部“二十四史”。参加“二十四史”、《清史稿》点校整理工作的前后共有近百名文史界专家、学者，历时二十年之久。“二十四史”、《清史稿》的出版，对我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名人云集是九十年来中华书局的一个重要特点。除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外，1949年前在书局工作过的有：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刘半农、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1949年后有：金灿然、徐调孚、陈乃乾、张政烺、杨伯峻、马非百、周振甫、赵守俨、王文锦、李侃、程毅中、傅璇琮、陈金生等。他们既是名学者，又是名编辑，这使中华书局一直与学术界保持十分良好的关系。这个特点从建局到现在一直保持下来，实在是很难得的。

中华书局的以上传统和特点，奠定了它在国内外的两个地位。

一是它的品牌地位。1949年前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可谓两家比肩而立的大型出版企业，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出版水准。两家都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均在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局、分馆。如果说中国的出版走出国门，步入世界的第一步从这两家开始，一点也不为过。1949年后，中华书局以整理出版中国历史典籍、中国传统文化而蜚声海内外，代表着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

二是中华书局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中华书局从出版教科书开始，到出版百科图书，到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在读者心目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如1949年前的《中华大字典》、《辞海》等书，为学术界所推崇，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多种不同版本的《辞海》行销海内外。1949年后出版的“二十四史”已经完全取代了各种旧的版本，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当前最好的本子，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那么，九十年的历史又给我们后来的中华人提出哪些思考呢？

前不久，新闻出版总署石宗源署长视察我局时指出：“中华书局应该总结一下，什么是中华书局的精神。”的确，在九十年中，中华书局有着一以贯之的魂魄——精神。无论何时，中华书局都将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在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服务的大局中赢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华书局的发展环境、发展机制、发展速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是，在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始终如一。这种精神用什么话来概括呢？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我们却能感受到它，甚至能触摸到它。它似乎是一种“匹夫有责”的精神，也似乎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更似乎是一种创新、敢为的精神。

如何继承传统，是引发我们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中华书局的两个传统并不矛盾，都应该继承。因为它们都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前者的中华书局是在爱国、进步，追求发展速度，以占有市场最大份额为目的的前提下的产物，而后者的中华书局是在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只强调为政治服务，社会效益代替一切效益为前提下的产物。前者的特点是大与强，后者的特点是特与精。前者和后者又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的共同前提。为什么二者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的共同前提呢？因为，在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只有把中华书局做大做强，才能保证做特做精，没有大与强作为基础，就没有条件来保障我们做特做精，也只有做特做精，才能保证做大做强，没有自我特点和没有精品产品的出版企业是一个没有发展后劲的出版企业。所以，大中含有特，强中含有精，应该是现在中华书局的发展目标。

为此，近几年来，我们在中华书局原来的发展基础上，走上了新的改革、发展的道路。



我们总的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主两翼”。“一主”，指中华书局的企业主体。中华书局经历了私有经济体制、国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在现今而言，则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我们通过四次改革，使中华书局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主体向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主体转变，正在朝着以实现现代出版运营制度为主体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迈进。“两翼”，一翼是指调整产品结构。在图书结构上，中华书局经历了从出版综合的、百科的图书到以出版中国历史典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这样一个过程。这种多元图书结构转变为单元的图书结构是计划经济导致的结果。随着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出版社由完全的事业单位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由仅追求产品的社会效益转变为追求两个效益。这种发展环境的变化，必然要求中华书局的产品结构作出相应的变化。由于投入大、周期长、读者面窄、销售慢等因素的影响，仅仅出版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不仅使书局无法进行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无法支撑书局的简单再生产，并影响人员的经济收入，必然导致出版资源流失、人才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无论从国家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还是从中华书局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考虑，势必要由原来的单元图书结构开始向多元图书结构的转变，实现以单元为主，多元为辅的图书结构。这种转变，并不是丢弃古籍整理出版和学术著作出版的阵地，而是要进一步强化和加大这块阵地，走“以书养书，以辅养主”的道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出版产品的多媒体化即将成为出版企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出版产品的电子化、信息化已被大多数出版社提到日程上来。正是在以上的客观条件下，书局才对自己的产品结构做了调整，由原来的2个板块，发展到12个板块。另一翼是建设市场网络。1949年前的中华书

局为了实现自身企业的扩张和建立产品的销售网络，在国内外建立50余处分局。1949年后由于国家实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计划体制，作为文化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社同样采取以地域分布与均衡发展格局，实行国家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互不隶属的出版管理体制。中华书局原来分局、分销处的部分功能被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所代替。中华书局的分局、销售处也随之解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中华书局1949年后形成的出版结构——古籍整理图书、学术著作，在市场上逐渐失去了与其他类图书相竞争的优势。加之，全国新华书店转变为纯粹的销售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书店将销售状况好的图书放在店面的主要位置，这样，很多其他种类图书的在架时间、上架率等都远好于古籍和学术类图书。种种不利于中华书局图书销售的因素，迫使中华书局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图书发行渠道，建立起自己的市场网络。不仅传统特点的中华书局的图书需要市场网络，而且调整后的图书结构也会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决定这些图书的两个效益的关键因素，同样在于市场网络。可以说，失去了市场网络，中华书局就失去了发展的条件。

为了实现“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近几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把体制创新与机制整合作为中华书局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中华书局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影响了中华书局的发展。突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成为过去几年的中心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的中华书局在体制上，根据内部各部门的工作性质制定了一局多轨的新体制；在机制上，根据内部各部门的功能要素，在全局实行权物分离、统分协作、整体组合的新机制。通过不断的改革、调整，不断的调试与整合，新的体制与机制的运行优势逐渐地显示出来。

二、把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作为中华书局蓄势待